

2101
雙流縣文史資料選編

第二輯



83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目 录

回忆父亲周列三	周铎鎬	(1)
怀念周列三老师	陈元春	(13)
和列三么爷爷相处的日子	周沛然	(22)
王干青、李筱亭在双流	周本纯	(26)
周列三遗诗四首		(37)
回忆抗战时期双流县城的女校	张万祿	(39)
父亲乔大壮	乔无疆	(47)
躬冒矢石为起义		
——同志军东路统领秦载赓事迹调查		
	王成一 秦子敬	(69)
对簇桥曾璧巨的调查	邱远应	(86)
四十年代府河航运概况	冯 直 成白非 李炳诚	(88)
我所知道的旧华阳县银行	曾光耀	(111)
解放前中兴粮食市场管窥	成白非	(126)
大林场鸦片的种植和销售	韩 华	(138)
朱礼诚办团始末	曾光大 江遂初 冯 直	(147)
民国以来双流县城的袍哥	瞿维祺	(173)

回忆父亲周列三

周 铎 稿

我的父亲周列三，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，他为革命事业、民族的解放，颠沛流离了大半生。或撰文，针砭时弊，或办学，传播革命思想，掩护同志，积蓄革命力量，为人民的民主事业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历尽辛劳，于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溘然长逝，终年八十六岁。

父亲周列三，正名周定华，列三是他的字，几十年来一直以字行。父亲青年时期，毕业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，与他同学的有王干青、李筱亭、张秀熟、谷醒华、肖华清等。在他求学期间，目睹社会动荡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于是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，立志社会改革。辛亥革命前后，他抱着改革社会的赤诚愿望，在四川军政界混过不长时间。在他亲身经历中，深深感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被人利用和篡改，成为欺骗人民的漂亮口号。革命的失败，使他失望、痛心，于是愤而回乡办学，把希望寄托于年青的下一代。

在此期间，他也曾有过开发资源、振兴实业、富国强兵的一丝幻想。早年，他同刘禹九曾到不毛之地的大邑县深山

老林唐王坝进行调查。那时的唐王坝荒无人烟，土匪出没，危害乡民。作调查时要沿途寄宿，连留宿的主人都极力劝阻他们赶快走，不要冒险。但他们意志坚定，不为恶人所吓倒，不为艰难所动摇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所得，终于写出《唐王坝山秘密之披露》一书。书中记载着若干年前，曾有人进入开垦，被土匪所抢掠，所焚屋宇，残迹犹存，是故外间传闻唐王坝神秘莫测，峭峻凶险，并非虚构。在那个时代，以个人的力量进行开发是不可能的；而当时四川之执政军阀只知争城夺地，搜刮民财，哪有余力想到去开发这样一个偏远的山区，故一直无人过问。解放以后，父亲对唐王坝的考述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，五十年代初，温江专署公安处据是书所提供的情况，在那里办了劳改农场，唐王坝从此才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。

1929年春，父亲在双流县城小学（当时为第一小学）任教，一天他正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，他师范同学王干青竟意外地出现在课室窗外。当时王是四川军政界的一位活跃人物，他的突然到来，使父亲立时预感到决不是闲情访友，一定衔重大事情之命而来。他将王干青安顿于一亲友家里，晚上与之密谈。原来，王干青在1928年奉党组织之命，在绵竹组织领导“七·四”起义，由于敌我悬殊甚巨，起义失败。王干青经由汶川、灌县辗转逃来成都隐蔽。他在反动统治的省城，总感到不安全，迫切需要一较好的环境，隐蔽下来，积蓄革命力量，继续开展斗争。他到双流来，找到我父亲，为的是能够开创这样一个环境。以后，王干青在双流定居下来，并通过他的介绍，父亲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。

革命有了新的内容。于是，他心里重又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，产生了投身革命，愿意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思想。是年，他提出入党要求，当时省委考虑到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双流上层的复杂关系，掩护党的地下同志，认为留在党外为宜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国内形式发生根本变化，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八大主张，释放政治犯，原被通缉的共产党人，到这时已经解禁。掩护任务完结。父亲才由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、李筱亭的介绍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接受掩护任务中，父亲毫不犹豫地将王干青同志从县城的临时寓所，接到一个合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环境。这个地方在红石桥乡下，离我家只有二百多公尺的一位农民家里。这里环境偏僻，民情醇朴，是个很适宜而又很理想的地方。后来，经请示中共四川省委同意，又将王干青、李筱亭两家老小，均陆续迁来这里，王干青化名王潜夫、李筱亭化名彭俊升，以教书为职业，在双流私立建平小学定居下来。此期间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也曾亲自来建平小学视察，部署工作；还有早期入党的郝谦同志（现省图书馆顾问），都曾来此养过病。

李筱亭是重庆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左派组织的负责人，1927年重庆“三·三一”惨案脱险幸存者。纵使这样，蒋介石仍把他定在通缉之列。在党的掩护下，他潜来成都，继由王干青介绍入党，以后又由组织决定转到双流隐蔽。李先生身材魁梧，又有一把大胡子，相貌特征尤引人注目，不宜各处活动。在来双流定居的初期，暂在红石乡下以塾师出现。

为了聚集革命力量，以迎接更多的同志的到来，父亲他

建平小学的开办，虽得到邻里、乡人、族人中绝大多数的好评，但也触犯了某些守旧势力族人的利益。同族中有家中设私塾者，建平一开办对族中子弟饷以免费，于是许多家长都愿把子弟送来建平就读，影响了他们的收入；他们就利用封建的族权，群起而攻之，或唆使族中长辈，以“办学校侵占了供奉祖先人祠堂”为藉口，煽动不明真象的族人，乘1933年清明会聚会之期，哄闹一场，迫父亲辞职离校，负有掩护地下同志使命的父亲，面对他所承担的革命工作竟遭如此严重挫折，在气忿与屈辱交相煎熬下，大病一场。还是王干青有办法，由他举荐本乡乡绅王少东出任校长，收拾残局。王欣然同意后，还增聘了本乡几位外姓人来作教师，事态暂时得到平息。好在那些旧势力只知争势逐利，对王、李二位先生的政治面貌未及过问。这次的风波，他二位安全无恙，仍然留在学校，父亲也就放心了。

经过这场风波，王、李先生更赢得了周氏族中上层人物的敬仰，认为他们出面斡旋，出了大力，在地方上威信大增，更进一步站稳了脚跟。1934年春，由于建平小学的发展结果，与周姓另一祠堂所办的濂溪初小合并，改名为岐阳小学。王、李二先生仍继续执教。父亲被迫辞职离校后，转往牧马山双华场闲居达一年之久。在这一年中，他潜心研学，宣传革命，撰写出《华族生命论》著述，刊行于世，以他自己当时的认识水平，阐述和论证了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。

建平小学自开办以来，迨至与濂溪小学合并为岐阳小学，历时五年，学生除本县本乡者外，有来自新津、邛崃的，

这固然由于当时小学不普及，就学艰难，家长们不惜远道送子女入学；但究其根本原因，学生舍近求远，还是建平小学的教学质量及其在社会上的信誉卓著。记得来建平求学的学生中，有家住县城南街杨思贤、杨荐贤弟兄，有家住九江乡的辛树云（即辛韧）。杨氏弟兄来校已是1933年我父亲辞去校长职务之后。后来杨思贤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名出色的轰炸机驾驶员，在解放战争中拒绝执行国民党要他去轰炸延安的命令，被开除军籍判了刑，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录用，成为空军部队中训练飞行员的教员。

建平小学之所以能使家长信服，吸引众多学生，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有王、李等革命者化名在此掩护，他们通过教学活动，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，激励学生走向革命的道路。在学校里，学生能读到党的地下刊物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之类的小册子；在课堂上，王、李二位先生总是通过教学，向学生灌输批判当时社会、政治方面的文章，如自编的教材，来潜移默化、启迪学生的觉悟。记得我还是一年级学生的时候，李先生在课堂上离开教本，给我们讲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，还有一篇古文，已记不清文章的题目，但这篇古文的部分内容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，其中有这样几句话：

“匍匐往，自投虎牙，虎曰‘善’，恭顺可喜，或者烹，或者腌，死后为俵没我疑。”

“吁，嗟夫！猛虎之虎谁敢仇，白骨委地无人收，古今天道常悠悠，杀人多者皆封侯。”

至今，我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出处，或许是他自己的著作吧。王先生没有直接教过我，但从高年级同学课后谈及他讲的

“实干、苦干……”，也可想见其言论的一般了。

他们的学识、品德、议论，颇能获得一些乡人的敬佩，尤其对学生的影响更大更深。1938年前后，学生中竟有五人加入了共产党，有的输送到解放区学习、工作；有的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双流县九江乡的辛树云，是父亲在龚家寺小学任教时教过的学生，后来转学到建平小学就读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是我家常客。他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进步很快，1938年入党，分别由王干青写信把他介绍给林伯渠，李筱亭写信把他介绍给罗瑞卿。与此同时，还介绍我哥哥周铨镐于1938年奔赴延安入抗大学习。1939年辛树云由党派往山东，以教师职业作掩护，从事地下活动，在抗日战争中病故。哥哥周铨镐，1938年正月初一日，由父亲送他启程去延安，抗大毕业后听其留解放区工作。原以为革命胜利后，一家得以团聚，殊不知他于1948年8月在解放军四野独八师保卫科长任内，因辛劳成疾，病故于热河建昌县上胡子沟，与我们竟成永诀。

父亲自二十年代初教书以来，总是寄希望于下一代，对于青年，总是有一种特殊感情，他这种感情是有条件的，凡诚实、上进、勤奋好学者，他就爱，就尽力予以帮助；这样的学生对他也就格外亲切、尊敬。如与我哥哥同车赴延安时才认识的王石泉（双流擦耳乡人，现名王自强，沈阳医科大学党委书记），他们同入抗大，后来因患肺病，生活需要特殊照顾，父亲每寄钱给我哥哥，均嘱其分一部分给王，王从延安来信总是表示感谢。1950年因寻找我哥哥不着，他还特地来信慰问。又如父亲在成都西北中学教书时的学生陈元春（现内江县人大副主任），由我父亲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

盟，任过《民众时报》校对，后又随父亲在我党控制下的成都女婴教养所工作，掩护身份，进行革命活动。1945年至1946年间，成都市民主同盟主要人物参加的重要会议都由他传递通知。

根据党的指示，以后父亲四处奔走，秘密活动。1939年春，他赴乐山五通桥通材中学任教，开展地下工作。当时的校长是李嘉仲，党支部书记为朱亚凡。1940年，朱被国民党特务诬其制造成都新南门抢米事件而加杀害。同年秋，父亲转入刘湘系之《建国日报》任主笔，社长为周绍芝（双流耆绅，红石乡人），正副总编辑为舒光实、赵星洲。1940年周绍芝死后，该报并入邓锡侯系之《华西日报》，由杨伯恺担任主笔。父亲离开报社又转到成都西北中学任教。1943年则转入慈惠堂收租组，继转该堂的女婴教养所。这时，由长江局张友渔指示，参加民主同盟，以盟员身份活动，因此女婴教养所也就成了成都市盟员大会的经常会址；而当时身为慈惠堂总干事的王干青，为了免于暴露，一般不参加这些活动，往往由父亲出面参加。

慈惠堂是一个慈善团体，1942年后由张澜继尹仲锡之后的总理，王干青任总干事，吸收了如李筱亭、肖华清、杜象谷等一批地下党员和民盟骨干、进步青年工作。在慈惠堂，他们除积弊、创新规，搞好火柴厂的生产，加强失怙孤幼文化卫生教育，改善孤老伙食，限期治愈女婴疥疮，使数千鳏寡孤独者幼有所养，老有所终；同时还让地下党员袁思治（解放后任南充市副市长，已病故）、周继丰（解放后任温

江专署副专员)等同志在厂里开展工运活动,开办工人夜校,开展时事教育,颇为活跃,曾一度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。

民盟开展活动,则由杨伯恺、李相符出面,组织干部联席会,并依靠它推动工作。“干联会”一周或间周开会一次,按照党组织的指示,布置工作,再由“干联会”成员在各自所属的区分部负责联系;有时座谈时事或形势,有时学习传达文件。父亲同于邦齐(即于渊)、肖华清、张万禄、刘明章等同志(都是地下党员兼民盟“干联会”成员)共同努力,贯彻党的指示,维护了民盟的正确方向,有效地配合民主革命斗争工作。

1946年,民盟四川省暨成都市组织为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、闻一多举行追悼大会,父亲同张澜、杨伯恺、于渊等领导同志,不畏强暴,不计安危,在特务疯狂捣毁破坏的情况下,带领盟员,毅然站到前列,如期举行了追悼会,表达对李、闻二烈士的哀思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。

1945年,父亲同杨伯恺等人筹办《民众时报》,经过曲折艰辛的斗争,终于在1946年5月1日创刊,发行人张澜,总经理杨伯恺,父亲兼任副总经理。《民众时报》是民盟的机关报,它一问世,就旗帜鲜明地鼓吹民主和和平,反蒋反美,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,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;也使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不安,视为眼中钉,肉中刺,不久于同年7月15日被蒋介石下令张群勒令停刊。《民众时报》停刊后,转为华昌印刷厂,这个厂的领导权仍然被操在地下党员和盟员手中,继续战斗。《民众时报》未被查封期间,曾翻印过毛主席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和党的其他秘密文件,对传播革命思想,鼓舞斗志,扩大党的影响,都曾收到一定效果。父亲

冒着危险，不顾特务的跟踪盯梢，常常跟着送报的青年，走街串巷，及时把报纸送到订户手上，有时甚至就利用送报的机会，与同志联系，传递消息。

在白色恐怖的年代，父亲总是留心保护同志。在西北中学教书期中，据我所知，学校党员不少，有刘露、刘郁民、瞿家千（即瞿白音）、郭健科、胡理和、朱通等。朱通因言论暴露，党组织决定由父亲通知他转移到云南边疆学会工作。父亲在这一段时期，还经常同一些党员、进步教师如马淑静、申止固、侯清溪等在学校附近的土桥乡下杨伯恺家里聚会。1942年夏，党员吴德让（解放后在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，病故）因暴露需要转移，当党组织还未决定他的去向时，父亲就出面将他暂时安置在牧马山双华场乡下邹文保家，他的妻子戴碧华有事需要联系，就都先到彭镇找到父亲，再由我带她到双华场邹家会面。暑假将完，避过敌人锋芒，他们夫妇才安全转移到川南纳溪县去。

在长期对敌斗争中，父亲总是以民盟身份活动，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却从未暴露。纵使这样，仍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，一有甚么风声，就四处搜捕他。一次，双流县侦缉队配合防护团深夜包围了彭镇乡下我家住房，由于父亲机警，使敌人扑了个空。1948年6月2日凌晨，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大肆搜捕共产党员、进步人士，杨伯恺、于邦齐、田一平等在这天均遭逮捕，华昌印刷厂被捣毁，成都地区一时乌云密布，人心惶惶。“6·2”事件的当天上午10点钟后，我回到九眼桥家中见到了父亲，我才放心。突有一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（后知她是失踪已久的育婴堂史堂长夫人），神色慌

张地跑来对父亲说：“今天清晨天未亮，开来一辆汽车停在街上，下来几十个人，闯进女婴教养所把我们逼起床，追问你在哪里，我们说不知道。他们到处搜寻一阵，天已经亮了，他们才慌慌张张爬上汽车走了。”父亲感谢她，还安慰她说：“不要紧的。”请她快走；临走时她又回头关照父亲：“他们来势凶啊！”“晓得了。”父亲镇定自若地回答。她走后，我也连声催他赶快走，殊不知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回答我：“不要紧的，吃了饭再说，我还要等一个人。”饭后，他所等的人老不见来，我说：“还是先走的好，你要等的人不会来了。”他最后很有把握地说：“白天特务不会来这一带安钉子的。”说毕令我先回川大去，说他马上就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出事后当天一早周沛然跑来报信，说华昌印刷厂已被捣毁，还抓走了人。父亲即令周沛然迅即赶到土桥杨伯恺家，见到杨夫人危淑元，得知杨伯恺果然在这次被捕；父亲得到周的回话后，才从九眼桥家中撤走。成都解放前夕，杨伯恺同王干青、于邦齐等被国民党杀害于十二桥。

事后我同父亲谈起“6·2”事件，我说要不是你那晚偶然回九眼桥家宿夜，岂不也遭抓走？他说：“我早就估计到特务要抓人，但仅是估计；当晚是姑且转个地方试试动静。”我又问：“你怎么估计那么正确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不是看到他们前几天已经在报上造谣，说共产党六月二日要组织暴动吗？这是他们行动前的舆论准备。”

“6·2”事件后的第一个星期日，我不放心，由川大回九眼桥家里看看，邻居袁婆婆对我说：“幸好你们俩爷子当天走了，到了晚上，我还在堂屋里念经，就有人打门，待我把门开开，还打我一掌，说我门开迟了，是在藏人；他们

找不到你爸爸，估说我把人藏起来了。我的房间被他们反复搜寻，逼我要人；我说你们好久好久没回来过了，他们不信，用刺刀戳破纸窗，又用电筒照里面，看见方桌板凳上积有厚厚一层灰尘，一个特务才说：‘是走好久了，桌上灰尘都这么厚。’”。其实当天下午父亲并未远走，只到离家不及二百公尺的火柴厂王干青家住宿，次日才由王派人护送绕道回双流，不久他又潜来成都又与党组织接上头，按照中共成都市委中层统战部洪德铭同志指示，和张万禄、周继丰等组成“中共成都市郊区工作委员会”，继续开展地下斗争，团结在乡知识分子、明达之士，有力地配合西南的解放。

怀念周列三老师

陈元春

周列三老师是四川双流县人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是我读高中时一位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，也是我一九四五年春加入民盟的介绍人之一（另一个介绍人是杨仲清老师）。我刚入盟不久，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担任民盟的具体工作及“成都女婴教养所”的工作。周列老对我的亲切关怀与鼓励帮助极大，使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，从而不断进步。特别是他的为人师表、革命的战斗精神及崇高品德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崇敬的。但不幸的是周列老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由于林彪、

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、折磨，竟于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含冤逝世，终年八十六岁。一九七九年六月在成都为周列老举行追悼会，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。现在他虽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，我仍感到悲痛，永远深切地怀念着他。

回忆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西北中学高中读书时，周列老任国文教员，他治学严谨，生活俭朴，作风正派，工作负责，一丝不苟，善于启发学生思考，提出问题，有问必答，耐心解释，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，随时关心学生的进步。记得我班一位同学异常勤奋好学，常订阅《新华日报》，并将其重要文章剪贴成册，进行学习，被周列老知道后给予表扬鼓励，号召同学们向他学习。我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在校能取得

不断进步，都与周列老的殷切关怀、谆谆教导分不开的。列老这种教学精神，令人十分感动，深受广大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一九四五年春，我在“成都女婴教养所”工作（当时我二十二岁），周列老任该所副所长（所长是王海平），这是一个社会救济单位，是直属于“成都慈惠堂”的慈善机构之一。慈惠堂理事长是张表方（即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同志，当时称为民盟总部主席）。女婴教养所绝大部分的教职员工都是民盟成员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老很谦逊地曾对我说：

“你来工作是经请示张老师（指张澜同志，他是列老读书时的老师）同意与支持的，你是来协助张老师工作的，今后我们要多向张老师请示汇报工作；张老师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……”。这一席话对我教育深刻，鼓励也很大。看得出来，他对张老师是极为尊敬和信任的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是这样作的。由于女婴教养所是当时成都民盟进行民主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，作为民盟省委委员（当时称为民盟省支部委员会委员）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之一的周列老，其工作重点必然放在盟务上面去了，而分配我的主要工作，则是在周列老的直接领导下做民盟内部具体工作。我和周列老同住一个寝室，生活起居工作都在一起，朝夕相处，获益匪浅。他的艰苦朴素作风，学习不倦，谦虚和蔼、平易近人，关心青年，关心同志，忘我工作，高尚品德，刚直不阿的精神，都是我学习的好榜样，使我永远铭记在心中。

周列老在一九四五年参加领导成都民主革命活动时，已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同志了，还是相当活跃。他从不露声色，谦虚谨慎，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，他精神抖擞，信

心十足地勤勤恳恳工作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，未见他休息过。不论去开会或其他工作，他都按时赶到，从不坐车；即是落雨或较远的途程他都一直步行，穿着、生活也很俭朴，在所里同职工一桌吃饭，不搞特殊，不摆架子，令人可敬，在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，列老仍坚持学习，每天必须挤出一点时间阅读进步书报、杂志，并鼓励我说：“一个人要干好革命，要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，就必须坚持努力学习，不断进步，增进广博的革命知识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”。这给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朴素作风，坚持学习、积极工作，寻求真理的良好习惯是个极大的影响。

据我所知，周列老除对民盟工作经常向张澜同志汇报请示外，还要与杨伯恺、李相符、田一平、张志和、于邦齐、谷醒华、肖华清、王干青等民盟领导同志分别接触 交 谈 研 究，以加强开展民主活动。他是一九三七年入党的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平时对来自延安的消息非常关心，经常盼望着。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胜利闭幕并在“新华日报”上登出毛主席《论联合政府》的政治报告时，列老见到后很高兴，在寝室中手不释卷地把它读完，并说：“今后全国人民革命斗争有了明确方向，胜利大有希望，国民党反动派注定要失败了……”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志从延安带来一份资料，列老看了又看，他很兴奋，叫我马上赶抄复写下来，分送几位领导同志传阅。我在晚上熬夜完成了这一任务，当即对我进行表扬，使我受到很大鼓舞。

不论是开会或开展哪项具体的革命活动，列老都给以高度重视和采取极端负责的态度，还亲自参加督促检查，他从不松懈，一直到完成为止，其中有不少生动的例子。例如一